mt

00

红山文明的长度、深度与高度

20世纪80年代,辽宁省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现 石破天惊,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直言:"这一发现 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国文明的起 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学 界开始把对中华早期文明的关注重点从距今4000年 的中原地区转向距今5000年以前的辽西地区。因此, 1983年红山文化"坛""庙""冢"的考古发现成为直接 推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标志性事件。不过,由 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以牛 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明虽然也有一些高质量的研究 成果,但相关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并未取得新突破。 最新的考古工作表明,红山文明才是迄今为止中国境 内出现的最早文明形态,标志着中华文明的正式起 步,她将目前距今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继续向前推进

红山文明的长度 延续时间最长的中华早期文明

红山文化继承了东北本土小河西文化(距今 9000-8200年)、兴隆洼文化(距今8200-7000年)和 赵宝沟文化(距今7000-6500年)的内涵与传统,正式 形成于距今6500年,并逐步与小河沿文化(距今 5800-4500年)一起融合为以辽西地区为分布中心、 北界至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北岸、南界至河北燕山的 "大红山文化",完整构建起东北地区查海时代、仰韶 时代和龙山时代的"史前三代"文化主动脉。以平底 筒形罐和"之"字纹装饰为代表的独具区域特色的陶 器文化面貌,以石耜和细石器为代表的农业、渔猎采 集并重的"兼业"型经济生业模式,以房屋并列整齐 分布、门道朝向相同的"非向心式"聚落为代表的社 会结构形态,以"崇玉尚龙"为代表的精神信仰理念, 在东北地区的史前三代文化中一脉相承。距今6000-5500年,在传承东北本地文化的基础上,红山文化借 鉴、吸收、融合了同时期以庙底沟文化为代表的周邻 文化精粹,聚落规模和结构变化越来越大,墓葬、礼 仪性建筑的等级差异愈加明显,随葬玉器所显示的 "礼制"特征愈加清晰,对同时期周邻遗存的文化辐 射强度越来越高,最终形成了物质文明发达、礼制文 明规范、精神文明丰富的红山文明,她奠定了中华史 前早期文明的基本内涵与核心理念。辽宁牛河梁遗 址和河北郑家沟遗址的新发现表明,红山文明的上 限可达距今5800年,下限可突破距今4800年,文明 长度极有可能突破1000年。

红山文明的深度 奠定了中华早期文明的"礼制"根基

以"坛""庙"为代表的祭祀制度。红山文明出现了 圆形和方形的祭坛、供奉各类"神"的庙宇和包括"金 字塔"式建筑在内的各类积石冢,清晰展示出红山先 民以努鲁儿虎山为依托,在辽西地区构建起以凌源-建平-敖汉区域为核心的特大型祭祀区、以阜新-朝 阳-宣化区域为重心的普通祭祀区,形成了以建平牛 河梁遗址为超级中心、以喀左东山嘴、阜新胡头沟、敖 汉元宝山、凌源田家沟和朝阳半拉山等遗址为次级中 心的完善祭祀体系。坛旁设庙,庙中供神,高规格的祭 祀场所和成熟的祭祀体系在同时期的东亚地区独领

以"冢""玉"为代表的丧葬礼仪。红山文明贵族阶 层形成了积石为冢、冢内列墓、唯玉为葬的埋葬习俗。 高大的积石冢经过统一规划,冢周边紧密陈列制作精 细、规格统一的空心筒形器,用以沟通天地神灵。带有 阶梯状墓道的大型墓葬居中而设,中小型墓葬有序排 列环绕在其周围。墓内随葬品罕见陶器和石器等日常 生活用品,唯玉为葬。这些玉器经过高超的雕、琢、磨、 钻等先进工艺技术制成,形制多样、造型逼真,首次达 到了东北乃至全中国对玉器的认知新高度:数量上,从 原来的零星出现到红山文明的规模化生产与专业化制 作;种类上,从早期单一的玦、环到红山文明复杂多样 的飞禽走兽、人龟熊龙。与高等级墓葬形成强烈的反 差,普通墓葬不仅规模小,而且随葬品匮乏,鲜明的社 会分层和成熟的丧葬礼制业已成型。

以"敬祖""崇神"为代表的精神信仰。牛河梁"女 神庙"中不仅供奉与真人规格、形态完全一致的彩塑 "女神像",还发现了以鹰和熊为代表象征力量的动 物,半拉山、东山嘴等其他祭祀场所也清理出陶塑、石 雕的人物及动物造型。这些不论是以女性先祖为代表 的祖先敬拜,还是以某些具有特殊能力动物为象征的 多神崇拜,都显示出红山文明社会复杂而稳定的精神 信仰体系已经完整构建。

红山文明的高度 确立了中华民族"崇玉尚龙"的精神内核

"玉龙"(或称"玉猪龙""玉熊龙")在红山文明玉器 中特征最鲜明,它是东北史前玉礼器制作的集大成者。 玉器的制作在黑龙江流域小南山文化(距今9000-8500年)已位居东亚之首,"龙"的形象在东北地区年

代较早的左家山下层文化(距今7500-6500年)以立体 式的"C"形石龙形态出现,在赵宝沟文化(距今7000-6500年)以平面式的陶器器表刻划龙纹形象呈现,红山 文明则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环形玉龙和勾云形玉龙,"崇 玉尚龙"的观念自此成为定制。从红山文明开始,中国 各地的早期文明此起彼伏,相互辉映,它们面貌有别、 内涵各异,但"崇玉尚龙"在这些早期文明中一脉相承, 成为文化认同的最强标志。南方地区的长江流域,距今 5000年的良渚文明,象征身份和地位的"琮""璧""钺" 等玉器,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常现身于高等级贵族大 墓,玉器上的"徽标"虽被解读为"兽面",但"龙"的因素 始终若隐若现。北方地区的黄土高原,距今4500-4000 年的石峁文明和陶寺文明,精致的龙形石雕图案见于 尊贵的"皇城台",罕见的彩绘盘龙漆盘随葬在高等级 贵族墓中,玉铲、玉钺成为特殊祭祀场所或贵族墓葬的 标配。中原腹地的嵩洛地区,距今4000-3000年的夏商 文明,绿松石龙形饰赫然出现在二里头遗址高等级墓 葬的墓主身旁,玉牙璋成为夏商时期各地不同群体最 高阶层的权力和身份代表,牙璋上隐藏的龙形饰也被 考古学家明确揭示。在商代,如果说青铜器与玉器是 "商礼"的两大支柱,那么距今3000年以降的西周至今, 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琥、玉璜已成为彰显"周礼' 核心的"六器"。从红山文明开始,玉已逐步升格为中华 文明的核心内涵,"龙"的形象也逐渐定格为中华民族 的唯一象征。

红山文明还有诸多未解之谜有待考古工作揭秘

作为出现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中华史前文 明,红山文明还有诸多待解之谜。田野发掘方面,与超 级祭祀中心牛河梁遗址(群)相匹配的大型生活聚落尚 未发现,辽西地区红山文明及其之后龙山时代普通社 会阶层的居址和墓地也有待更多揭示。学术研究方面, 以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和第五地点为代表的重要积石 冢是否属于"王陵区",中心大墓墓主人是否为"国王", 周围小墓是否为"王室成员"。诸多祭坛到底为谁而建, 是一坛一祭还是一坛多祭,这些坛是否兼具祭祀和天 文的双重功能。新发现的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与牛河 梁遗址(群)究竟有何关系。红山文明出现的诸"神"在形 成和发展过程中,时间上有无早晚先后,地域上有无方 位差别,级别上有无高下之分。红山文明与小河沿文化 究竟是"分立"还是"一体"。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定论, 也未达成共识,亟待学界深入讨论。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浅论丁埂遗址出土"虎纹刻符"石钺

2022年8月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丁埂遗址进 行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包括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 良渚文化的遗物。其中包含一件"虎纹刻符"石钺,这件 石钺发现于良渚文化的祭祀高台上,双面均刻有"虎 纹""鸟纹"以及"卷羽"等符号。这是太湖边首次发现的 良渚文化"虎纹刻符"石钺,其双面均刻划复杂的纹饰, 非单纯的工具,已经具备了审美价值与象征意义。

石钺的刻划纹饰

这件虎纹石钺两面刻划的图像要素一样,仅在布 局上稍有差异,可分四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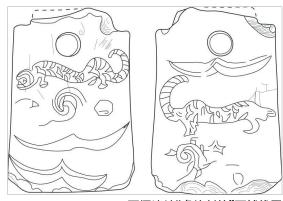
首先,"虎纹"是主体。石钺上的虎纹共两组,每面 均刻有一侧身虎像。虎1在穿孔正下方,头向左,无耳, 头部用C形曲线表示虎张嘴吼叫的动作,下颌有两尖 牙,显示出凶猛状;虎背与臀部向上拱起,腹部下伏,似 前行状,用曲线线条表达虎的动态姿势,以弧线组成的 弯月和"人"字纹表示虎的花纹;虎尾向上勾卷,用横线 表示虎尾的花纹。虎2在钺的正中部,头向右,亦是虎 头下垂、曲身、卷尾的造型,但头部细节少,身体和尾巴 等细节的刻划相较虎1更显粗糙。两虎纹一左一右组 合在钺的两面,立体地呈现了虎的全貌图案,虽不够精 美,却生动地刻划出虎咆哮前行的威武姿态。虎为万兽 之王,因其威猛的形象受到史前先民的敬畏,在中华民 族的精神信仰中一直是勇猛、威严、正义的象征。

其次是"人"字形鸟纹,石钺的两面刻有由曲线组 成的形似"人"字的纹饰,共三组。鸟纹1、2在虎1面的 底部,鸟纹3在虎2与穿孔之间。鸟纹1由四条弧线组 成,鸟纹2、3与之类同,仅在内部添上一道"人"字线 条。简单的几笔线条引人想象,像展开的鸟翼,似缥缈 的云气,亦如连绵的群山。与此相近的刻划符号最初见 于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大口尊上,常与圆形组合出 现,对其较流行的解读一是火纹,与其上的"太阳纹"合 释为"炅"或"炟"字;一是鸟纹,与其上的"太阳"组合起 来表示"飞鸟负日"。东南沿海地区的先民自古便有对 鸟的信仰,在神话传说中,鸟与太阳的意象相通,故将 此纹饰称为"鸟纹"不无不妥。

接着是螺旋状的"羽纹",石钺两面共两组螺旋纹, 分别位于两虎纹的下方。由中间顺时针散发出五个线 条,呈旋涡状,最内一条弯曲并向左下延伸出去。其状 如轻盈的卷云,又如蓬松的羽毛。良渚文化中有头戴羽 冠的神人形象,羽冠不仅是首领的身份象征,还是巫觋 通神的道具。所以这里的螺旋羽纹也指代羽毛或羽冠, 象征权力与神力。

最后是点缀的菱形纹,在卷羽纹周围有两组状如四 角星的菱形刻划图形。由四个弧线组合而成,造型随意 而简单。有学者通过与甲骨文的对照,将其释为"凡",解 读为"风",认为是族徽或人名标记。

大张的虎口在钺上,是凶猛的象征,是对敌人的震 慑,是权力与威严的象征。鸟与羽在良渚文化中具有神 性,是神职人员的道具,这里与虎纹组成了鸟兽组合, 赋予了石钺通神的意义。这件石钺的特殊价值一是"虎 纹刻符"的独特性,这是在太湖地区的首次发现,将史 前时代的崇虎信仰聚焦到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二 是艺术价值,从简单的图案中能看出抽象与具体的结 合、多元的统一,展示出了新石器时代工匠的手工艺水



丁埂遗址"虎纹刻符"石钺线图

平与审美;三是文化价值,刻划的元素蕴含了良渚先民 原始的自然崇拜和族群信仰。

石钺刻符所见文化交流

这件石钺更为重要的价值是它所承载的史前文 化交流、传播与传承。钺上的虎纹、鸟纹、羽纹和菱形 纹等并不仅仅出现在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时期,在 多个地区均有类似刻符的出现,可由此探索文化间

中国对"虎"的崇拜由来已久,河南濮阳西水坡45 号墓中蚌壳堆塑的虎是中国艺术中最早出现的虎的形 象,墓主人左手侧为虎,右手侧为龙。这件石钺与蚌塑 龙虎时空相隔甚远,但不变的是相同的写实风格。长江 下游地区较早的虎形象见于凌家滩遗址的玉器上,虎 首璜87征:3一端雕虎,双虎首璜87M8:26是两端各雕 一虎首,两个玉璜的虎均为侧身形象,有耳、眼、鼻和前 爪,阴刻虎斑纹。良渚文化中虎的形象不多,饕餮纹和 兽纹曾被解读为变形的虎纹,但终究脱离了虎的原始 形象。对虎的崇拜并没有在当地广为流传,而是向西传 播到长江中游地区。后石家河时代的肖家屋脊文化瓮 棺中随葬有玉虎,有虎头、虎形牌等类型,均出现在高 等级的墓中。谭家岭遗址瓮棺葬W3和W9中的玉虎与 石钺上的虎纹造型可谓如出一辙,侧身虎像,同为张 口、曲身、屈肢、卷尾的形象。对虎的崇尚从长江下游传 播至长江中游地区,这种信仰跨越了时间与空间,从新 石器时代传承至后世。

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大口尊上的"弯月"符可算 作"鸟纹"源头, 莒县陵阳河遗址采集的陶器就有这种 刻划图形,常与"太阳"和"山"形符号组合出现。长江下 游良渚文化庙前遗址 G3①:39等陶器上,也有"人"字 鸟纹,还见于玉璧或玉琮上。同样的鸟纹还在长江中游 地区出现,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遗址的大口尊AT812 ③:10上有三条弧线组合而成的刻划纹。

长江下游本地崧泽文化的陶豆圈足上最早见螺旋 刻划的装饰,如南河浜遗址 M26 圈足上。螺旋纹饰在 良渚文化的玉器上主要用作装饰性的地纹,它作为单 独的图案则见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中。肖家屋脊 遗址的中口罐H357:5上有一执钺的人物形象,其头 顶戴竖冠,冠上有一螺旋纹,是指冠上的羽毛。

菱形纹的出现亦可从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找 寻,在莒县陵阳河M19和大朱家村M26的大口尊上有

相同的纹样。同样形状的刻划还发现于石家河文化肖 家屋脊遗址缸JY5:2上。

在大致同时代的地区均有相似的刻符与造型,说 明区域之间存在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可能是物品的 交换、人群的迁徙和文明的传入等。尤其是丁埂遗址所 在的太湖西北部处于多个文化交汇处,北面是大汶口 文化的海岱地区,西边是凌家滩文化的巢湖地区,东南 是良渚文化的中心——良渚瓶窑区。虽然这些文化不 同时,但仍能对此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石钺上的刻 符图案,跨越海岱地区、长江下游与长江中游地区,将 大汶口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肖家 屋脊文化串联在一起,呈现了文化融合的现象。

石钺的性质

丁埂遗址中的石器数量和渔猎用具的占比之高在 同级别的遗址中极为罕见,也没有发现大量玉器,说明 了该遗址更重视农业渔业的生产活动,应不是举办祭 祀丧葬等礼仪活动的高等级聚落。这件刻符石钺虽暂 未发表出土位置、共出器物等详细信息,但毋庸置疑的

是,它无法与良渚文化高规格的钺礼器相比。 从形制上看,良渚文化有打制的有肩石斧,但有肩 石钺十分少见。这件石钺的顶部稍残,有双肩,器身为 近长方形的梯形,上端穿一圆孔。在反山、瑶山等最高 等级墓葬中的石钺为圆角舌形或"风"字形,穿孔大,部 分穿孔处有朱绘的绑缚痕迹,钺面较宽,器体薄。次一 级的赵陵山M77中有4件有肩石钺,但肩部不明显且 钺面宽大,穿孔有朱绘残留,显然与丁埂遗址的这件石 钺不同类。与之形制相同的仅在更次一级的卞家山 M11和新地里M30、M49、M104等单位中有几件,它们 均出自小型墓葬,那么这件石钺所在的单位应与之同 属一个级别。

从刻符上看,钺上刻划的内容虽然丰富形象,但技 术略粗糙,远不如良渚文化礼器上的图像符号精细美 观。可能是工匠技术水平不高、等级低,并不是能雕刻 出神人兽面纹的高级工匠。另一种可能,这是高级工匠 的练习之作,不是正式场合使用的成品礼器。目前本人 更倾向于后一种可能,原因还在于这件钺的材质为石 质,同时刃部有使用痕迹,显然为实用器而非专用礼器。

从性质上看,石钺主体的虎纹不是长江下游地区 的常见纹饰,时间和地域上与这件石钺最近的虎纹出 自巢湖地区的凌家滩文化,但是凌家滩遗址中没有相 同形制的石钺,那么有理由猜测,它是带有凌家滩文化 因素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器物。故不排除本地区的先民 是由巢湖方向迁移而来,从而保留了凌家滩文化中虎 崇拜的可能性。

综合上述情况可推测,这件石钺是地方聚落的小 首领的陪葬物品或当地礼器工匠的所属物,其族属可 追溯至巢湖流域的凌家滩。

丁埂遗址的这件"虎纹刻符"石钺,填补了中国史 前崇虎信仰从凌家滩文化到肖家屋脊文化的时间空 白,为探究考古学文化的跨区域交流与融合、文明信仰 的传播与传承等问题提供了帮助。随着更多考古资料 的公开和考古工作的开展,相信会有更多的信息披露, 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

(作者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

2022年,盐城中国海盐博物馆 (盐城市博物馆)、镇江博物馆联合对 东闸新村墓地(头墩)进行抢救性发 掘,共清理西汉至明清时期墓葬270 座,其中汉墓14座,M82保存最为完 整,等级最高,系竖穴土坑木椁墓,由 边厢、足厢、棺室三部分组成,皆为楠 木材质。结合该墓椁盖顶部铺设竹 席、棺缠绕丝帛,以及墓中出土的蟠 螭菱纹镜与淮安王庄村 M98、仪征 联营M1出土的蟠螭纹镜高度相似 等情况判断, M82的相对年代为战 国末期至西汉早期。

研究结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考古实 验室对 M82 汉墓出土植物遗存、残 留物部分样品进行鉴定与分析。结果 如下:M82出土的植物遗存共4种, 包括黍(Castanea mollissima)、枣 (Ziziphus jujuba)、杏(Pyrus ussuriensis)、板栗,另外还有6粒特征不 明显的种籽,未鉴定出种属。

黍 (Castanea mollissima) 黍 为禾本科黍亚科黍属,一年生栽培草 本。此次在M82脚厢中出土的黍多 带壳,其颖果已腐朽消失,因多粘黏, 无法统计具体数量。由于为饱水环境 保存,这些黍保存良好,黍稃片表面 清晰可见,但在离开饱水环境后,迅 速氧化并发生一定程度的形变。本次 在东闸的两份植物种子颖壳中共发 现3种类型的植硅体,包括黍稃壳n 型、刺棒型和光滑棒型植硅体。从发 现的数量来看,以光滑棒型和刺棒型 较为常见,结合植物种子形态,推测 该样品中的植物遗存应包括黍。黍为 人类最早的栽培谷物之一,谷粒富含 淀粉,供食用或酿酒,秆叶可为牲畜 饲料。由于长期栽培选育,品种繁多, 大体分为粘或不粘两类,本草纲目称 粘者为黍,不粘者为稷;民间又将粘 的称黍,不粘的称糜。

枣(Ziziphus jujuba) 枣树属于 鼠李科(Rhamnaceae)的枣属(Zizyphus),是一种落叶乔木。东闸新村 M82出土的枣根据其果核形态明显 可分为两变种:一类核果呈矩圆形或 长卵圆形,核顶端锐尖,基部锐尖或 钝,种子扁椭圆形,长约1厘米,宽约

板栗 (Castanea mollissima) 栗是一种常绿或落叶乔木,属于壳斗 科(Fagaceae)栗属,落叶乔木,其果实 含糖度高,口感甘甜。《诗经·郑风·东 门之郸》中有"东门之栗,有践家室" 的诗句。板栗在墓葬和文献记载中都 较为常见。M82出土的板栗有29枚, 具比较完整、光滑的黑褐色种皮,宽 楔形,表面光滑,顶端有小尖突,果疤

杏 杏又称杏子,是蔷薇科(Rosaceae) 蔷薇亚科(Rosaceae subfamily Prunoideae) 杏属(Prunus)的一种 植物。核卵形或椭圆形,两侧扁平,顶 端圆钝,基部对称,稀不对称,表面稍 粗糙或平滑,腹稜较圆,常稍钝,背稜 较直,腹面具龙骨状稜。杏是我国原 产的一种果树,《夏小正》中载有"梅、 杏、杝桃则华",《山海经》中记有"灵 山 …… 其木多桃、李、梅、杏"。在荆 门包山楚墓中也出土了杏,这说明早 期古人便存在对于杏的利用,也将其 用作随葬。

材料分析

从整体上看,江苏地区出现原 始农业的时间并不晚于黄河流域, 其农业发展形态也具有区域特色。 在先秦及秦汉时期,中国农业生产 的重心长期停留在北方的黄河中下 游地区,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在整 体上弱于北方,此时江苏的农业发 展重心也集中在靠近北方的地区, 呈现出明显的北重南轻格局。

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 苏北地区 发现多处重要遗址,如顺山集遗址、 韩井遗址、龙虬庄遗址等,相关的植 物考古研究工作表明,在距今8000年 前后,苏北地区已经存在对于稻的利 用,对韩井遗址水稻植硅体的研究发 现了驯化类型的水稻小穗轴,表明当 时已经开始驯化和栽培水稻。万北遗 址的研究表明,在距今约5720年到 4426年粟黍已传播至苏北地区,并形 成了稻、粟、黍的混合农业模式。

春秋战国时期,受吴文华和楚文 化的影响,推行了火耕水耨的水田耕 作方式。秦汉时期苏北地区气候由暖 湿变为暖干,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苏 北地区旱作农业逐渐确立其在农业 中的优势地位,小麦和粟等作物逐渐 成为重要的实物来源,尤其是小麦在 其中占据重要地位,而苏南则以稻作 农业为主。西汉晁错在《论贵粟疏》中 认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 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汉代农书 《汇胜之书》中也记载,"凡田有六道, 麦为首种"。由此也可以看出,秦汉时 期农业生产中麦、粟等旱作农作物地 位的重要。特别是在苏北地区的气候 条件对于水稻种植适宜性降低的情

况下,水稻的种植局面 必然会出现相对衰减 的情况。因此,秦汉时 期苏北地区已经从先 秦时代的水旱作物并 重,转变为以麦、粟种 植为主、水稻种植为辅 的局面。

当前部分研究表

明这一时期,粟和小麦

已经成为苏北地区的

主要作物,但此次对 M82 的大植物遗存和 微体植物遗存分析仅 发现了黍,但并未见到 稻、粟或者小麦。这是 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 现象,这表明黍仍旧在 这一区域被用以随葬, 黍在西汉时期的重要 性可能被低估,至少在 汉武帝中期前后,苏北 地区仍旧保持对黍的 利用。在江苏仪征市联 营汉墓遗址出土的植 物遗存中包含有八种 不同的农作物,即黍、 粟、麦、粱、稻、麻、大豆 和小豆,表明汉代联营 地区墓中随葬农作物 符合当时葬仪的最高 规格。甚至在连云港孔 望山墓地中也发现了 稻、粟、黍、小麦、大麦、 大豆六种作物,这表明 在江苏淮北地区隋唐 时期仍旧延续了自大 汶口早期(6300-5600BP)就形成的多品 种农业种植体系。

在事死如生的丧 葬观念下,谷物历来就 是墓葬的重要内容。汉 代常有"黍万石""粟万 石""黍粟万石"等字样 的陶仓类储存明器,是 当时流行的陶仓墓葬 文化,墓主人拥有数量 的多寡,能够彰显其生 前的社会地位和身份, 或是表达对阴间生活 的一种期冀。在M82中 发现的黍也表明这一 时期,人们对于黍仍是 非常重视的。

综上所述,虽然小 麦已经传入并被大力 推广种植,比如晋元帝 曾经下诏徐扬两州种 麦,诏曰:"投秋下种, 至夏而熟……于以周 济,所益甚大"。(《晋 书》)但"麦饭"仍是粗 陋饮食的代名词。在官 府的大力倡导和面食 习惯的逐步普及下,麦 子的重要性稳步上升。 但在苏北地区,西汉时 期黍仍旧在先民的饮 食习惯和思想观念中 占据一定地位。

植物遗存反映的其他信息

墓主人的下葬时节

分析植物遗存的花果期为我们 讨论墓主人的下葬时节提供了重要 信息,本次发现了黍、板栗、杏、枣, 其中黍多为带壳保存,更易储藏,无 法判断其是否为当年所产,但板栗 水分含量较高,储藏时极易失水、腐 烂或发芽,枣和杏也多难以长期保 存,因此其大概率为应时随葬,其花 果期应该与墓葬埋藏时间相近。

杏的花期在3~4月,果期在6~7 月。枣的物候期:花期5~7月,果期8~9 月;板栗的物候期:花期4~5月,果期8~ 10月;结合杏、枣和板栗的成熟时间, 该墓葬的下葬时间大概率在7~8月。

果品的品种及来源

从"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出 发,不难推测M82出土的植物遗存 应该是墓主人生前喜食的果品。

板栗广泛分布在中国,除青海、宁 夏、新疆、海南等少数省区未见。杏主 要产于我国北部地区,栽培或野生,尤 其在河北、山西等省普遍野生,山东、 江苏等省也产。枣生长于海拔1700米 以下的山区、丘陵或平原,广为栽培。 目前盐城地区仍大量生产板栗、杏、 枣,结合其三种果实不宜长期储存、远 距离运输等特征,基本可以确定该果 实为本地出产。

结论

经过对东闸 M82 汉墓出土植物 遗存和残留物的研究分析可以得出, 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盐城地区的葬 俗具备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基本特征, 同时黍仍旧在饮食中占据一定地位, 并被用作随葬品。结合枣、栗、杏的花 果期,这些果品应产于本地,推测墓 主人下葬于7~8月。

(作者单位:盐城中国海盐博物馆 盐城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 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